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⑳
2009年廖風德先生學術研究獎

改造的誕生

王良卿 著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 I S T O R Y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 20

改 造 的 誕 生

王良卿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改造的誕生／王良卿 著

--初版--臺北市：政大歷史系，民國 99 年

面： 公分 .--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20)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02-3202-8 (平裝)

1. 中國國民黨 2. 改造 3. 蔣介石

005. 29

99007539

□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 20 □

書 名 改造的誕生

著 者 王良卿

出 版 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發 行 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地 址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六十四號

定 價 新臺幣伍佰元整

承 印 者 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89號7樓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ISBN 978-986-02-3202-8 (平裝)

主編序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創立於 1967 年 7 月，旨在培養歷史教育和史學研究人才。為使學生能有更專業之訓練，本系先後於 1976 年成立碩士班、1987 年成立博士班，研究領域初以中國近現代史、中外關係史為主，漸擴及中國近現代史與臺灣史、一般史和世界史等三領域。

四十二年來，本系致力提升學術研究水平。以師生及同好為基礎，成立研究社群，定期將社群研究成果發表或出版，藉以和學術界廣泛交流並獲致公評，乃為提升研究水平的重要方式。本系主要出版品計有：以教師發表研究成果為主的《政大歷史學報》、研究生發表研究作品的《史粹》，以及大學部學生學習討論園地《史薈》，均定期出刊，並獲國科會人文期刊評比的肯定。為使教師研究專書與博、碩士班之優秀學位論文得以出版，本系於 1995 年決議規劃「政治大學史學叢書」，以呈顯本系師生專題研究成果。

本書作者為王良卿博士。他就讀政大歷史系碩士班時，即已對國民黨的歷史產生興趣，1995 年提出碩士論文〈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為其啼聲初試之作。進入本系博士班就讀後，他更擴大其視野，將觀察國民黨的歷史發展，延伸至戰後初期在臺灣的改造運動。本書即為王博士就其博士學位論文改寫而成，並列入本叢書第 20 種。

1949 年國民黨自大陸撤退來臺，隔年即在黨內推出改造方案。本書乃針對此項改造事業的歷史意義，提出檢討。何以國民黨會在撤守臺灣之初，即有此一改造工程？過去學界有「外因」及「內生」兩種不同的見解。「外因論」強調國民黨來臺後進行改造，乃緣於反省國共內戰失利、退守臺灣之挫敗而有之舉措。「內生論」則認為：改造的呼聲，早在 1950 年退守臺灣之前即已出現，改造的目的、對象實則融匯了前此數十年間針對不同目標而提出的各種方案。本書作者王良卿博士比較站在內生論的觀點，強調要理解此一改造工程，絕不能忽略戰前國民黨內部總總組織架構及運作失當的結構問題，亦即，改造的動因，不僅源於內戰失利的刺激，更與長期以來內部自生的改造推力有關。是以王博士將國民黨萌生改造的起點，上推至 1927 年的黨務整理運動，向後衍溯中日戰爭結束後的革新運動。本書大量運用了近年逐步解密開放的《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經國總統檔案》等珍貴史料，使得作者能在改造案五十年後，得以更為完整而宏觀的視野，回溯釐析其間的始末與幽微：改革的目標，糾纏於總裁權力、黨內民主化、派系鬥爭；也擺盪在廉能明君清官的道德政治與自由主義式民主理想政治的價值衝突。王博士也特別指陳，改造引動了極為複雜的權力競逐，而蔣介石的改造藍圖也未必完全展現了他個人的絕對意志，相反地，蔣介石往往也依違在自己的改造理想、權力護衛與派系利益平衡的糾葛中。黨務改造最終的圖像，是 CC 系的解散以及三青團、復興社及黃埔系確立其在臺灣政治場域的力量。至於此一改造工程究竟給予國民黨多少新生機會，使其改造成一個嶄新而具有牢固共識的政治中心？作者留下了開放的空間，邀請讀者進一步省思。是以在此謹此鄭重向關心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讀者推薦這部紮實的作品。

呂紹理

2010 年 4 月 15 日

目 次

主編序	i
目 次	iii
圖表頁次	v
緒 論 尋找改造之路	1
第一章 國民黨的內在秩序與危機(1927-1945)	27
第一節 黨國體制下的黨內新秩序	28
一、黨務整理運動	29
二、黨紀與政治忠誠	35
三、黨內民主問題	43
四、派系代理政治	51
五、強人領黨的復現	60
第二節 革命失墮與黨人集體焦慮	72
第二章 戰後革新運動與黨團統一(1946-1948)	101
第一節 黨內右翼與政治清議	102

第二節	革新運動的運作與沉寂.....	134
第三節	黨團二元體制的終結.....	159
第四節	黨團統一與本位意識.....	182
第三章	徘徊於重整與分立之間(1948).....	211
第一節	蔣介石尋求組織鼎革.....	212
第二節	決戰前夕的黨內輿情.....	233
第三節	潰局中的威權與統制.....	256
第四章	政權流離中的改造藍圖(1949).....	285
第一節	雲水行旅：從溪口到草山.....	286
第二節	廣州方案與重整精神.....	307
第三節	轉向激進更張的腹議.....	334
第五章	國民黨邁向威權改造(1950)	355
第一節	構築改造與程序民主.....	356
第二節	權力漩渦裡的CC系	383
一、自由中國勞工同盟收編事件.....	385	
二、中央海外部副部長易人事件.....	396	
三、中華日報社拒陶風波	405	
四、陳誠、陳立夫，與CC系	413	
第三節	黨政蜩螗中的斷然決策.....	429
結論	改革的秩序與變異	461
徵引書目		499

圖表頁次

表1：	國民黨開除／永遠開除黨籍案由類型比例 (1939年7月-1950年7月).....	42
表2：	省市黨部委員產生方式與其施行黨部數 (1929年底與1933年底狀態).....	49
表3：	施行委派等黨委產生方式的省市黨部比例 (1929年底與1933年底狀態).....	49
表4：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選出的常委及其派系屬性 (1946年3月)	132
表5：	國民黨黨員與三青團團員人數歷年成長圖 (1930-1947).....	175
表6：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試行行政院長人選假投票結果 (1948年5月21日).....	230
表7：	黨務座談會發言者要旨分類與人次統計 (1948年8月3-4日).....	247
表8：	1949年〈本黨改造綱要〉條文立意溯源： 以官方文件為中心.....	313

表9：	經蔣介石核定的改造籌備委員與其他候核人選 (1949年11月23日).....	321
表10：	各級黨部與黨人針對1949年改造方案提供意見件數 (1949年10月止)	327
表11：	國民黨人研討改造方案期間更改黨名的輿論舉隅 (1949年9-11月).....	332
表12：	日月潭會談甲乙兩案改造程序對照 (1950年1月2日).....	351
表13：	1950年1-3月的改造研議小組成員與改造籌議的淵源 (1949-1950).....	358
表14：	國民黨幹部籌議更改國民黨名稱情形舉隅 (1938-1950).....	366
表15：	第六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人數動態統計 (1950年1月20日).....	372
表16：	在台北中央委員談話會舉行概況 (1949年12月-1950年3月).....	374
表17：	蔣介石出席國民黨中央常會情形一覽 (1950年1-7月).....	439
表18：	第六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動向分布統計 (1950年7月15日).....	449
表19：	在台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居地分布概況 (1950年7月15日).....	449
表20：	在台中委呈請總裁斷然改造的連署與未連署人數 (1950年7月18日).....	450

表21： 中央常會通過的1949與1950年改造方案比較

.....454

緒論 尋找改造之路

台北賓館的總裁茶會

1950年7月26日下午五時，一百五十餘名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魚貫進入台北賓館內的一間會議室。根據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稍早遞給中央委員的出席通知，總裁蔣介石將在賓館的茶會場合發表重要談話。

這是1948年春天以來，蔣介石第一次會晤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¹由於內戰的迭次失利，國民黨政權飽經流離；隨著戰事的崩潰，最後在1949年底正式轉寓海島台灣。截至1950年7月中旬，國民黨已在過去一年多內，陸續號召了人數適巧過半的中央委員(含候補委員)——二百六十七人——來到台灣齊襄志業，26日的賓館茶會則是聚攏了其中五成多比例的在台委員，約一百五十餘人。多年以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羅才榮回憶當天茶會的情景，錯認跟隨國民黨赴台的中央委員總數「竟只」在場的一百多人，語間似見悵然。雖然

¹ 1948年4月4日至6日，國民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討論行憲首任正副總統提名問題。

這位出席者的回憶未盡符合事實，不過，他對於幾年之前中央委員仍保壯盛人數以及此刻台北賓館徒留蕭瑟陣容的對比描寫，倒是生動的勾勒出國民黨遭逢世變、流寓台灣的特殊時空處境。²

其他四成多置身台灣的中央委員(約一百一十人左右)為何缺席總裁的茶會？依照常理判斷，獲悉時間的充足與否，以及居住地點的遠近，可能都是必須列入考慮的因素。不過這無法充分解釋下列的事實：根據保守估計，即便是住在台北當地的中央委員，起碼仍有八十人(或更多)並未赴會。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秘書處通知中央委員的專函早在茶會之前兩天就已經發出了，因此至少對於那些置身台北的中央委員而言，獲悉時間與居地距離似乎都不太可能成為合理化缺席的理由。除非沒有獲得國民黨中央的邀請，否則他們的缺席行徑勢必具有一些可堪玩味的解釋線索。例如當時甫自西昌倉皇棄軍轉抵台灣，刻正面臨監察院彈劾窘境的中央執行委員胡宗南，即以「患病不能前來」為由，具函國民黨中央告假。³

無論胡宗南所持的告假理由是否真實，至少避免了此刻出席公開場合可能帶給他的尷尬感受。像胡宗南這樣，基於個人健康狀況或是其他不為人知的私人因素而缺席茶會的例子可能還有，但是高

² 截至1950年7月15日的統計，中委全體人數(含候補委員)五百一十三人，到台人數(含候補委員)則為二百六十七人，占全體中委五成二比例。〈現有中央執行監察委員人數統計及其分佈表〉，1950年7月15日，毛筆原件，【國：蔣中正】特交檔案，一般資料(1950年)，第342冊，編號：39000074；同標題與內容，亦見油印件。毛筆修改，【黨：會議】6.41/91。羅才榮的回憶：羅才榮，〈「改造」之歷史意義與時代使命〉，羅才榮，《才榮文稿》，續二(台北：川康渝文物館，1990)，頁104-105。

³ 在台的中委居地分布狀況：〈在台中央執監委員分佈表〉，1950年7月15日，油印及鋼筆原件，【黨：會議】6.41/110。胡宗南的告假，見〈胡宗南致中央秘書處請假條〉，1950年7月26日，毛筆原件，【黨：會議】6.41/110。

達四成多的缺席比例是否悉數因此造成，仍然是令人懷疑的。事實上，國民黨幹部集體缺席總裁主持黨內聚會的情事並非此刻首見，例如有些黨人對於五年前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委後的當晚，超過半數的全代會出席代表拒絕參加總裁邀宴的一頁往事猶有深刻印象。那次在重慶召開的全代會幕後，各派系圍繞著中央委員選舉問題掀起複雜糾紛，蔣介石為了謀求紓解，不惜親自介入，兩度調升應選中委名額，並且強力主導選舉辦法，黨人私下多有憤懣、怨懟的情緒。根據若干國民黨人留下的憶述文獻透露，六全大會出席人員拒絕參加總裁晚宴之舉，正是作為抗議姿態的一種沉默表示。⁴

台北賓館茶會的缺席情節是否意味著國民黨人又一次的無聲抗

⁴ 1945年召開的六全大會行將改選超過九年未曾變動的中央執行、監察委員陣容，會前各主要派系業已針對中委席次問題組成一龐大聯合陣營，用以防杜CC系壟斷選舉，並爭取個別派系的利益擴充。這樣，六全大會也就毫不意外的衍成宗派相排的權謀戰場。蔣介石為紓解計，乃大舉擴充中委名額，復強力主導選舉辦法，形同變相主宰中委人選。聯合陣營無處著力，只得唯蔣是聽，然而黨人已滋不滿，急進者目蔣為獨裁，餘亦有對蔣多所怨望者。詳見王良卿，〈派系政治與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六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選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1期(台北，1996年12月)，頁137-150；邵銘煌，〈為抗戰勝利而綱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開與時代意義〉，《近代中國》，第149期(台北，2002年6月)，頁128-129；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1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317-332；「事略稿本」，1945年5月6，16，19，27日條，【國：蔣中正】。六全大會選舉日當晚的總裁邀宴，參見羅才榮，〈「改造」之歷史意義與時代使命〉，頁104；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上冊(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頁354；程思遠，〈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頁179；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5)，頁135；康澤，〈康澤自述〉，康澤等著，《康澤自述及其下落》(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頁175-176。

議？在更進一步的資料出現之前，筆者無意將這個問題輕率導入肯定的答案。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如果與五年前的重慶全代會相較，中央委員在 1950 年對於蔣的怨望其實並不稍遜。賓館茶會舉行前四天，蔣介石交議的一套國民黨改造方案甫於臨時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當中獲得通過。該案迫使中央委員拱手讓出明載於國民黨總章的法定職權，蔣介石則得以伸張身為總裁的最大權力，自由遴選一批人數精簡的中央改造委員，俾便組成一個全新的委員會，取代原有中央執行、監察兩個委員會的政治職能。無論層峰是想安撫這些即將停權的中央委員，或是打算尋求他們對於改造大業的支持，總之，這正是蔣介石邀請他們前往台北賓館茶敘的目的。

半年多以來，包括不少中央委員在內的國民黨員再三籲請黨中央舉行一場正式的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以便匯聚眾意，決定國民黨流寓台灣之後的政治路線與黨務改造計畫。如果中央全會召開之議成真，那麼就將是國民黨史上的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也是國民黨遷台後的首次中央全會。不過這個願望落了空，所謂的六屆五中全會始終沒有舉行。蔣介石運用臨時召開的中央常會，以逐條討論，最後採取全體起立的表決方式，順利通過他所主導的改造方案，隨即公開發表，中央委員幾乎無從置喙。嚴格說來，蔣的非常之舉不盡然符合黨內民主程序，因為國民黨總章明文規定中央常會應向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結果這次包括中執委在內的全體中央委員之法理職權，卻由中央常會通過的改造案給剝奪了。⁵

⁵ 根據國民黨總章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機關／最高權力機關，具有修改總章以及決定黨的政綱政策等職權。雖然「最高權力機關」字眼在 1945 年遭刪除，但全代會的最高地位在總章中仍清晰可見。由於國民黨剛自中國大陸隨同政府播遷台灣，一時不易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以決定黨的前途問題，

事實上，蔣介石在 22 日臨時中央常會發表的在台改造說明，以及 26 日台北賓館茶會的訓話當中，甚至認為自己和中央委員應該為「四年來黨的信譽之失墜，兩年來黨的失敗之慘痛」負起政治責任。⁶根據蔣的語意，他在三年前早已發動一次「政治革命性的，而非技術的」改造，即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三青團)的合併，史稱「黨團統一」。兩個組織積不相能，雙方共同領導人蔣介石原本寄望他的跟隨者能夠捐棄成見，藉由合併達成改革黨務、集中力量的使命，以便抵禦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的武裝攻勢。透過合併作業，國民黨接收了三青團的組織與財產，並且納入三青團的團員與領導階層(不少出席台北賓館茶會的中委即係團方出身，例如羅才榮)。然而黨團兩造菁英不僅「不能達成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的目的；並且自中央至省縣，黨內派系排擠傾軋，更變本加厲，漫無止境」。

因此退而求其次，黨內輿論要求舉行一場中央全會，認係顧及黨內民主程序的較佳方式。不過1950年7月，蔣介石規避了該途徑，逕行選擇中常會的場合通過其所主導的改造案。儘管總章明載中常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執行職務」，不過總章也清楚的揭示二者的位階關係，亦即中常會「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其責任」。然而原本應向中執會負責的中常會，轉而服膺總裁蔣介石的個人意志，中央委員竟致停止行使職權。當然，人們可以爭論：總裁代行／行使總理職權，享有「最後決定之權」(「代行／行使」之字詞更易，係以1945年六全大會修正總章作為分界)。但是在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過程當中，一向多有嚴格認定總裁職權的聲浪出現，這就使得蔣介石透過中常會行使的決然作為，略欠道德合法的基礎。關於國民黨總章的相關條文，參見蔣嘯青編述，《中國國民黨黨章沿革概述》(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8)，頁121，124-129。

⁶ 蔣中正，〈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臨時會議，1950年7月22日，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台北，1954)，頁932，以下縮寫為《六屆中常會紀錄》；〈總裁訓示〉，1950年7月26日，鉛筆速記便條，【黨：會議】6.41/111。

蔣暗示他的高級幹部：黨團統一後的中央委員已經浪擲了改造國民黨的一次絕佳機會，因此這次他心目中再次肩負政治革命使命的改造宏業，不能再被這批「敗壞紀綱、蔑視組織」的委員左右了。⁷

在 26 日的台北賓館當中，沒有一位中央委員為自己被剝除的職權公開提出異議，或許他們出席茶會的行為本身，就是保證了某種形式的服從。包含羅才榮在內的七名委員當場發言，宣示了效忠總裁、貫徹改造的個人立場。接著在蔣介石的即席要求下，台北賓館會議室的全體與會委員一致起立擁護改造方案。這些政治動作似乎顯示，先前黨內民主程序的瑕疵已經透過中央委員自己的同意，得到差強人意的彌飾。蔣介石隨即宣布以行政院長陳誠為首的十六名中央改造委員名單，名列其中的蔣經國獲得了時人的注目，位於羅才榮鄰座的谷正綱同樣獲得蔣介石的政治任命，並且成為日後仍能在黨中央發揮具體影響力的少數 CC 系高層分子。⁸人們熟知的國民黨在台改造運動即將揭開序幕。未來兩年又兩個月內，這十六個人領銜組成的中央改造委員會暫時成為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與最高執行中樞，並且直接向他們的權力授與者——蔣介石——效忠、負責。

⁷ 蔣中正，〈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頁 931-932。

⁸ 台北《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27 日；〈總裁訓示有關改造工作及與會人員意見要點〉，1950 年 7 月 26 日，鉛筆速記便條、鋼筆便條，【黨：會議】6.41/111；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 10 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50 年 7 月 26 日條，頁 99；雷震，《第一個十年》，第 2 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1950 年 7 月 26 日條，頁 153；羅才榮，〈「改造」之歷史意義與時代使命〉，頁 105-106。